

# 诗意的呐喊

## ——《大工地诗歌集》解析

文/李大君

我曾有位同事，她有个美丽的名字，叫“美丽”。她说，大工地就是一个江湖。

而提到“工地”，你会想到什么：掺杂各色人等的江湖？一群没有文化的民工？糟糕的生产生活条件？衣衫褴褛的服饰？神情呆滞的眼神？还有那岁末年初无休无止的讨薪大战？

这或许是你看到和想象的一面，而我要讲给你的是大工地的另一面。

### 一、走进大工地

最早涉入建筑工地是在 2007 年夏初。虽然，我的父亲和村庄里的男人们大都做过建筑工，但我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2007 年春末夏初，当时还在云南西双版纳工作的我，因为失业，我曾在工地上做过两个多月的工。那时，我还是一个省吃俭用、乐善好施的“月光族”，以致于在我工作八年后结婚时，妻子就惊奇地发现我竟然没有存款。而在那时，失业的我必须尽快找个活儿来养活自己。而像我这种社会工作科班出身的人，就业门路其实挺窄，越是在小地方，越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索性，凭着一身力气去干干搬砖的活儿。

通过以前同事的介绍，我跟随包工头阿三哥到工地做工。说是干建筑，其实我们所做的活路不是建，而是拆。随着地产资本的扩张，城市周边的村庄不断被征收用作商品房开发用地。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圈建的工地上，把村民已经腾空的房屋拆掉，做好土地的平整工作。西双版纳的民宅主要是竹木结构，我们需要把屋顶的瓦片和大梁归置好变卖，当然，收入全归承包此项活路的包工头。收拾瓦片的活儿主要交由妇女来做，而扛大梁的活儿就落在了我们男工肩上。扛大梁两人一组，一根大梁直径在 20 公分至 40 公分，长度从 5 米到 8 米不等，重量在 300 斤至 400 斤不等。我们上午 7 点开工，中午 11 点半下工，吃过午饭后，下午 1 点开工，晚上 6 点半小工，工作 10 个小时。我们要做好大梁的拆卸、搬运和装车的活儿，我们两人一组，每天要完成二至三栋民宅的拆除工作，其中拆卸和搬运大梁四五十根。这是建筑工地上最没技术含量也是最累的活路。每天下来，我整个身体像散了架一样，腿疼、腰疼、肩膀又肿又疼。

和我搭伴的工友叫海生，他原本是西双版纳州医院的一位药剂师，因吸毒被强制戒毒，从戒毒所出来后，在染上毒瘾后，妻子与他离婚，父母也与他断绝了关系。从强制戒毒所出

来后，举目无亲的他投奔了阿三哥，开始跟随阿三哥在建筑工地做平整土地的工作。海生没有家，他在阿三哥家吃住劳动，但没有工钱，阿三哥十天半月会给海生一百块钱零花钱，阿三哥的说法是，钱给多了，海生会再去买毒品。

海生身材瘦削，但精神还不错。他一点都不忌讳向我叙说他吸毒和戒毒的历史，包括在强制戒毒所参加帮派斗殴。他在戒毒所的最后一次斗殴时，用一支牙刷穿透对方一人的口腔再从后脑勺露了出来，人有没有死就不知道了。担心承担刑事责任，他趁乱穿过戒毒所墙上的铁丝网逃了出去。当然，不久之后就被抓。被重新抓到戒毒所后倒也没受什么处分，被他伤害的人也再没见到过了，反正吸毒的人要么已是家破人亡，要么已是妻离子散，没人关心你的死活，而对于戒毒所，死个人做一个毒瘾发作死亡的医学证明即可。不过，再次进入戒毒所的海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因担心在戒毒所受到另一帮派的报复，他必须得抓紧时间完成戒毒出去。他做到了，走出戒毒所的他来到大工地做了一名工地小工。

海生虽然瘦削，但力气比我大。每次我们两人扛大梁，粗的那一头都是他来挑，而我则扛细的那头。我渐渐喜欢上他了，似乎每天来工地扛活儿的目的是为了听他和其他工友来讲他们的故事。我们这些在工地上做工的人，大多家人都不在身边，单身汉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打发。下工后，我们会去澜沧江边江边钓鱼，晚上在江边的露天烧烤摊就着柠檬春的牛肉干巴大口喝着澜沧江啤酒，憋不住了就朝江里撒尿，看谁尿得远……

工友们一个个活脱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生活经验丰富，总能带给我很多新奇的经历。工闲时，我们一帮人跑到竹林里挖竹鼠，有时晚上还会拿着弩箭去射杀来玉米地里觅食的野猪——虽遭遇过几次野猪，但从来没有真正射杀过，猪没事儿，野猪嚎叫着狂奔过来的架势倒是把我吓得不轻……这些生活如今回想起来，恍如隔世。

这样安逸和恣意妄为的时光，在我 26 岁生日那天发生了转变。2007 年 8 月 1 日，大学班主任张和清老师带了一位年轻的女学者来到西双版纳，约我赴北京共同开创一项旨在促进建筑工人福祉的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的工作。由此，我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工地江湖中来。

人间·新工人食堂，这是我们介入工地江湖的第一个项目，或者说是产业。或许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吃货，或许是想重新找回在西双版纳那种海吃海喝加海聊的感觉，或许这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能让我们接触到各色人等，抑或我们就真想办一家面向工人群体的社会企业……如今回想起来，我们那时那么天真、那么富有激情、那么敢想敢干。2008 年 3 月初，我们的“人间·新工人食堂”就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大工地旁开业了。开业当天的热闹之后，我傻眼了，我们连第二天营业的食材都还没有准备好，赶紧将“正在营业”的牌子翻过来，变成“暂停营业”，而我自己也被批得灰头土脸。当晚，班主任张和清老师飞到

北京，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并根据他当年承包云南大学电影院的经历，教我如何进行商业运营。当晚，我们在阴冷的餐厅后厨席地而睡。其实，比开局不顺更让人气馁的是我完全对前途是迷茫的，我不知道重新回归公益领域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真是一个劳神费力且不讨好的事情。

可是，命运就这样为我迎来了转机，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女人出现了。2008年3月下旬，两名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来“人间·新工人食堂”做服务员，而我则拖着疲惫回到城里做短暂休整。当晚，我们山西籍的厨师打来电话，称“不得了啦，今天的营业收入比往常增加了三倍，这俩女娃娃你得留下，她们真是做服务员的好材料”。第二天，营业收入保持持续上涨态势。在城里的我歇不住了，在第三天晚饭时赶回食堂。眼前的一幅场景竟然让我联想到了《水浒传》里的孙二娘，一位女学生正在跟工友们喝酒划拳，好不热闹。我不由得惊叹，中华女子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真接地气啊！由此，我认识了这位中华女子学院社工专业的班长周周，她的泼辣干练突然让我这种内心小鸟依人的男人有了一种想要去靠近的感觉。没错，她就是在“人间”团队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人，后来我以身相许。

周周的到来不仅扭转了我和“人间·新工人食堂”的颓势，而且让我们在建筑工地的的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至今，仍能够在工地江湖中听到有关“周周姐”的传说，诸如智斗老田、拳打钱文宏、大闹西山华府等等，她的故事在工人群体的传播中越来越被赋予一些传奇色彩，而她自己也成为很多工友钦佩的女英雄，就连刚直勇猛、曾拳打过无数工地混混的建筑工人李建华都在公开场合说他只服“周周姐”。

透过“人间·新工人食堂”，我们结识了很多工友，并透过工友网络得以进入到建筑工人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在一起行走工地的日子里，我们接触了很多工地工人的生命故事。美丽说，行走在大工地就像闯荡江湖一般。在这里，我们能遇到各种有着不同生命故事的人，有的人因为工厂管理太严，任务量太大，生活不自由，来了工地；有的人因为在家种地不赚钱，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厌倦了农村每天繁重、复杂的农活，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没有其他技能，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曾经进过监狱，想重新开始，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生意失败，为重整河山，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追求工地的自由、洒脱，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追求工地的高工资，来到了工地；有的人因为能和老公夫唱妇随，来到了工地……每个人来工地的原因都不同，不是每个故事都那么无奈，也不是每个故事都是暗淡无光的。但是，我们遇到的所有人，在踏进工地的那一刻，都没有想过要在工地上干一辈子，但一经踏入工地，似乎就像进入预设的轨道一样，很难脱轨。鲁迅先生有句大家耳熟能详且多用在中学作文中的名言，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换作工地上，那就

像我的工地朋友杨最革所言“前面已经有了车轱辘印儿，一经踏入就没有了别的选择”。是啊，在这个阶层日渐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所有人都在混各自的朋友圈，很难跨界。当我们的视野和工作范围进一步拉伸，就更能强烈感受到国家、资本、土地、劳工和城市在这个江湖中的关系与角力。

而我们的介入，似乎让我们和他们彼此的生命多了一种可能。

在我的十年劳工之路上，我参与了很多工人权益事件的介入，但这些年来最让我珍视的不是帮助了多少工人维权，甚至也不是我们推动了国家在政策制度上的改革，而是我们对工人文化的重新发掘与塑造。于是，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一份小报——《大工地》。

## 二、小报《大工地》

周周来到“人间”后，她开创了我们在工人工作方面的很多个第一。她创造的第一个第一，就是开办了工地上的第一个工地书屋。办书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书从哪里来？周周活动能力很强，她硬是让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为工地捐赠了一批报刊杂志。这批报刊杂志让工友们很长见识，但意见也不小。有工友说了“这个《瑞丽》杂志确实好啊，教人描眉化妆穿衣打扮，可我们就算是能把自己收拾这么好，给谁看呢？”还有工友说了“给我们看的报纸能不能来点新的，拿给我们去年前年的报纸来看，这就有点对我们不尊敬了。”

根据工友的意见，我们开始编辑面向工地读者群的季刊《安全帽》。《安全帽》一共编辑了五期，但由于时效性较差，无法满足工地工人对资讯的及时获取，故而在2009年9月，我们正式推出了工地月报——《大工地》，每期4个版面，印数3000份。作为“小报”，《大工地》定位很“小众”——就放在给建筑工普法、提高文化上；但又很贪心——报纸虽小，栏目设置却“五脏俱全”：“社会新闻”关注中国当下的重大劳工新闻和劳工政策；“时事评论”通过评论重大劳工事件激发工友思考，在QQ群上形成讨论；“工地故事”通过其他建筑工成功的讨薪、维权案例，给工友们做表率；“知识天地”以最平白的语言把劳动合同、工伤鉴定等最基础的法律知识，讲给建筑工友听；“工友心声”全刊登的是工友通过手机、QQ或干脆是手写稿发来的小诗、小画。而且，我们有一个坚持，坚持每期都有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到工人宿舍里，把小报亲自发到工友的手上，并给他们做导读，而后也开始有了工友志愿者的加入。

《大工地》第一期发行后，我们最担心没有反馈的“工友心声”栏目竟让成为最受欢迎的栏目。我们陆陆续续收到工友对报纸内容的反馈：

有工友说：“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要，想谁会给建筑工免费发报纸？讹钱咋办？后来，几个胆大的要过来瞅了瞅，一瞅，嘿！这个好！然后，大家都不怕了，乐意看。”

还有工友提出来，希望字印大点，尽量用中小学生的词汇来写文章，这样更容易接受些。

还有工友说，我们教给他们的维权知识很管用。

也工友对《大工地》的印刷纸张提出了意见：“咱们这报纸的纸张又硬又脆，擦屁股时刺屁股，还容易抠破，不如《新京报》纸张柔软，有韧性。”

《大工地》第二期开始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订，包括印刷纸张的更换。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在“工友心声”这个栏目，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工友采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情感。念一首建筑工人写的诗歌给你：“晨起星落迟，晚归月升早。当日汗干湿，静夜香魂绕。居处随天篷，吃斋遵佛道。烟燎忧不去，酒浇愁更烧。”

这首诗歌出自河南籍建筑工人释嵩师傅的手笔，他用自己的诗歌《愁》来展现了建筑工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建筑工人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的边缘人群，他们来时，这里一片荒芜，杂草丛生；他们离开时已经是红砖绿瓦，高楼大厦。重体力的劳动、全年无休的工作常态，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群体在这样荒芜偏僻的一隅蜗居着。



（北京海淀区保利·西山林语工地的工人住宿区，炎热的夏天，工人连个洗澡房都没有，于是，这样一个水池就成为工人集洗碗、洗衣、洗澡为一体的场所。对此，河北籍工人谢仲成师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暑工》：“夏日炎炎汗流淌，吃苦卖力浑身脏。借问澡堂何处寻，厕所屋中摆战场。污水遍地蚊蝇狂，臭气熏天难躲藏。可叹广厦千万间，没有半间洗澡房。”

记得我们第一次带女同学来工地做探访时，女同学见到这一幕尖叫一声捂住了眼睛，受到惊吓的工人也随之大叫一声，扔掉手中的脸盆火速跑回宿舍，把被子裹到身上。我们后来安慰我们的女学生不要大惊小怪，权当来到公共泳池。渐渐地，渐渐地，大家就都习惯了，你走你的道，我洗我的澡。）

释嵩师傅是我们《大工地》最早的读者之一，也是最早给我们投稿的工友。他在2009年底的天津工地上，从带班的面包车里捡到了半张《大工地》报纸，幸运的是，就这半张《大工地》报的右下角正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于是，释嵩师傅开始用手机编辑短信给《大工地》投稿。直到三年后的第二届“大工地诗歌节”上，他才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大工地》报和自己那变成铅字印刷的诗歌。

释嵩师傅与《大工地》结缘的故事不是个案，由于经费有限以及发放人手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把报纸送到每一位工友的手中。《大工地》的读者群中，有很多工友获悉《大工地》都是很偶然的。我们的“硬汉”李建华认识我们就是在2010年底，带工人换宿舍时，从上一拨工人留下的遗物中看到了《大工地》报的一个角，恰恰这个角就只有“联系我们”这一个栏目，他当即打电话给我们，并由此开启了我们延续至今的相伴相随。

鉴于很多工友经常接触到碎片化的《大工地》，我们编委会特意在每个版面上都印刷上我们的联系方式。而江苏建筑工友李英华则是在上厕所时，捡到了别人擦屁股没用完的《大工地》报纸。2011年，建筑工友李英华将他的作品发给了我们——

别离秋，上心头，自此化作相思愁，空回首，月如钩，酒醒花落，风淡霞收，忧忧忧。  
快乐否，难猜透，心似秋千人空瘦，念忧忧，何时休，望断高楼，可有来后，候候候。

——江苏籍建筑工人李英华《钗头凤·别离》

如同李英华工友的诗词，家庭分离之苦已成为进城务工农民情感的重要表达。2015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讲话中指出，农民种1亩地收入跟城里打工1周差不多，而且近年来种地普遍是赔钱的。大资本下乡促使这些失地农民不得外出打工，饱受离别之苦，而守在家里，生活则无着落。农民外出打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造成的感情问题、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位、空巢老人生死由命缺乏照料等等，这像是一个死局，无解。



（借酒消愁愁更愁，情到深处泪难留。大哥在讲到家里的沉重负担时，黯然神伤：老人看病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种子化肥价格疯涨，种地却越来越不挣钱，无奈的生活逼得人不得不从土地剥离出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几乎成为所有农民进城打工的理由，生活就这般考验着人生的无奈和生命的韧性。）

而如果夫妻能够一起来工地打工，那则是要羡慕很多人的。女工是建筑工地这样一个男性化非常强的场域中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我们的调查发现，在建筑工地上，只有 3% 的已婚群体有幸和妻子一道在工地做工。夫妻能够在一起做工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就像这首《傻夫妻》：

我叫金凤霞，今年二十八。  
娶了一个夫，戏称李大傻。  
为啥说他傻，抛妻离开家。  
四季去打工，下苦来养家。  
在外能吃苦，危险他不怕。  
钱没挣多少，浑身叠伤疤。  
爱着心中他，我也装回傻。  
来到他身边，细心照顾他。  
虽然屋简陋，总算是一家。  
一对傻夫妻，相伴到天涯。

诗的作者是河北籍建筑工友谢仲成。谢师傅是在 2010 年春从工地下工时，恰好从住宿



区的一间夫妻房经过，看到了一张人家用来糊窗户的《大工地》报。他说：“大工地很少有真正的夫妻房。所谓的‘夫妻房’，就是在一个集体混住的宿舍，一张床，用布帘子遮起来，就成了‘夫妻房’，夫妻间的小秘密也全是在众多双耳朵下进行。”但尽管如此，如诗中所说，能“来到他身边，细心照顾他”就已万事足。如此卑微的爱情，却每天都在这空旷（工地）又狭窄（混住宿舍）的大工地上演。



（年终，一对夫妻工要赶回家与老人孩子团聚了。一针一线，妻子把刚领到手的工钱缝进布袋里，再将布袋缝在衣服内侧。床铺上，散落着预备在火车上吃的方便面、小菜和几百块钱“车费”。其中有几十块钱“预算”，要在火车上给留守的孩子捎一个礼物。这是每个岁末年终，工人们结账走人的时候最常见的一幕，几乎每个工地宿舍里都有。工钱来之不易。拿到钱的丈夫和妻子掩不住喜悦，脸上带笑，行色匆匆。没有拿到钱的工友，默默看着他们，眼神里丝毫不掩饰羡慕，甚至嫉妒。）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看到《大工地》则是在回家的火车上，从火车地板上席地而坐的其他返乡农民工的屁股底下讨来的。他将这张报纸贴身收好，在寒冬腊月的雪夜，背着沉重的行囊返乡与留守乡村的妻儿团聚，并依着报纸上的手机号码，在凌晨一点时为我们发来这样一首诗：

**野旷雪重映钩寒，一载飘摇人终还。小儿不知劳夫苦，笑解兜囊数新钱。**

建筑工地欠薪高发，假若如王运朋师傅这般能够在岁末年终将工钱讨要到手，那已算幸运。

2003年10月24日，因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替建筑农民工讨薪而引发的“讨薪风暴”，



将建筑业包工制度恢复后造成的大量欠薪问题大白于天下。国务院作出决定，从 2004 年起，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拖欠问题，温家宝总理亲自推动这项工作。2007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代表国务院宣布，完成清欠任务，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 330 多亿元，农民工工资支付走上正轨。然而，在我 2007 年年底到达北京时，我仍旧遭遇了不少被欠薪的建筑工人，这其中包括奥运场馆的施工工人。我想我们这些“地命海心”的人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帮中央政府兑现承诺。

2008 年，我们启动了旨在服务建筑业农民工的“牵手计划”。该计划依托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和志愿者，进入建筑工地提供系统的文化、教育和个案辅导工作，提高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发展能力，增强这一群体的自强与互助精神，促进城市务工人员政策空间的改善。

官方统计，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数量达到 6000 万，但真实的数据远不止于此，由于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关系不正规，很多从业人员未能纳入统计范围。从人员构成来看，占建筑业农民工总数三分之二的巨大群体都有过社会主义生活经验，在思想上还保留有社会主义的一些色彩。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更容易将社会主义教育同自身的生活经验相结合，也更容易以社会主义时期的行为方式与眼光来看待周围事物。而就劳工维权而言，他们对现有的依法维权渠道是陌生和摒弃的。以现行的劳资关系分析框架的视角来看，建筑业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抗争比不上加工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从阶级语言的宣扬来看，他们又比不上仅以阶级口号为最后抗争资本的老国企工人。但是，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农民工群体中与土地联系最紧密的，资本在农村的扩张无疑引起他们的质疑与反对，他们是资本在农村圈地运动中最激烈的反抗者。但是，他们在农村反抗资本圈地的斗争注定不可能取得大规模成功，就像他们现在不会觉得生活在农村有出路一样。农村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需要有一批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开展社区合作经济，但从客观现实来看，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困难的，它也许会在某些地区取得成功，但不会是大规模的。因此，我们还需将重点放在建筑业农民工在工地生产中的具体劳动实践来分析。

从建筑业农民工的权益实践来看，以维护和规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对于建筑业农民工的维权来说基本是无效的，“人间”八年来接手的一千余起建筑工劳动争议案件，没有一件是能够依照单纯的法律渠道来完成。尤其是自 2012 年以来，建筑业农民工维权更是遭遇比 2008 年以来更为恶劣的法律环境，地方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实施细则、内部文件和司法解释等弱化和歪曲上位法的方式，将工人与公司间的劳动关系转化为工人与包工头间的劳务关系，将无劳动合同的依法讨薪判决为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建筑

业农民工依法维权越来越难。严峻的维权形势，政府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与资本的媾合越来越明显，逼得建筑工人开始反思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并进一步反思生产关系。而此时，透过《大工地》以资本运动、生产关系和阶级的分析视角进行工人教育自然水到渠成，也恰好承接起建筑工人已有的社会主义生存体验。

做出这样的转变，这与人间在工地工作中遭遇的困境也有重要关联。在工地工作中，我们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如果只纠结于具体的维权，很多问题是无解的。而工人的集体行动已经催化出一些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前途的思考，如共产打工队、行业性组织化工会都是最早由工人提出，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顺应了这样一种具备社会主义指向的先进思潮。

2013年初，《大工地》开始进行改版，报纸由月刊改版为半月刊，编委会每两周开选题会，报纸为应对建筑工人对未来的想象，设立“劳动主义教育专栏”，以更强的故事性来传播劳动主义思想。2013年秋，《大工地》的整体风格开始全面转向劳动主义教育，这种劳动主义教育不是空洞和说教的，而是能够与工人的经验对接，并且是具象的，如《大工地》改版后针对工人的现实问题，不再纠结于讨薪、工伤维权、增加工资和保障福利等，而是直指缩短工时和将组织化落地。与其他具体的权益保障相比，缩短工时是最具劳动主义面向的斗争，也只有缩短工时，工人才有时间学习，有精力来思考自己的前途。在工地，由于人力成本不断增加，而包工头包活儿价格并没有变化，他们只有不断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于是，缩短工时成为劳动生产过程中工人与包工头间最尖锐的矛盾。但在现有的包工制度下，缩短工时、八小时工作制将意味着包工头的破产。起初，这种斗争势必引起我们要拉拢的包工头对工人的强烈反击，但随着斗争的深化，包工头群体实现重新洗牌，小包工头将破产成为工人。这就催生了最底层包工头愿意与我们联合争取建工会，以期在劳资谈判中从公司层面获得更多利益，缓解他们的生存危机。

在社会发展理论的认知上，《大工地》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文章。如左楠的《工人与机器——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流水线工人与机器在梦境中的对话，向工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用工制度不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发生变化，科技越发达，工人越解放吗？”林风则在《流动的历史，流动的草根》一文中指出，为何“领导孩子当官得利，农村孩子打工种地”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现象。文章通过聚焦于劳动者的阶级固化以及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溯源，了解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草根的命运有什么不同，最后再重新反思单位制，尝试在对单位制的思考中探寻出一条属于底层草根的发展出路。熠慧的一篇《我们不是商品》向工友们介绍了他们在上职校的子女如何充当比他们更为廉价的学生工，从而对职业教育如何成为资本的牟利工具进行了剖析，指出了职校生未来的发展路径。璐璐则围绕一篇高考材料作文《老

王生病》为题，通过评论文章《谁拿走了老王的治病钱？》揭露这个高考材料作文既反映现实又“别具匠心”地扭曲是非观念，在良心医院、良心老板、知恩图报的穷人等人物设定的包装之下，一系列的问题被灵巧地遮蔽：为什么身为建筑工人的老王没钱支付医疗费？为什么治疗费用必须由老王独自承担？为什么身为劳动者的老王不能享受医疗保险？聪雷在《鲁迅走了，孔子来了》一文中，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评论，指出教育如何为反映现实，又如何成为统治的工具。所以，今天鲁迅离开，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不好，而是他的文章太写实，有人再也不想听他那尖锐的革命呐喊了；孔子回来，也不是孔子真的有多么高明，而是他那套君君臣臣的主张，天然地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罢了……这些与现实、与工人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文章，成为把人们从虚幻中叫醒的重要呐喊。

同时，《大工地》还做了两项改革：一是针对无法领取到纸质版报纸的工友发行《大工地手机报》；二是扩大覆盖面。报纸以对发放人员的低要求来加紧扩展它的覆盖面，发放报纸相较于对人员经验和学识要求更高的宿舍探访来说更具可实施性，因其可深可浅且传播迅速而广泛，更能招募到充足的发放人员，加之工友的纷纷解囊，每期的印刷量也从早期 3000 份，拓展到高峰时期的每期 7000 份，即每月有 14000 份纸质版报纸发放出去。

《大工地》改版后，对工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首先，工人诗歌相较于以往，多了一些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批判，少了一味的抱怨与诉苦。在第一辑大工地诗歌《5·1，我要你听到劳动的声音》里面，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更多是工友们对家乡的思念、对工地的不满、对资本的控诉以及无法摆脱的自己阴郁的未来，虽偶有抗争的表达，但不是主要表达。而在此之后的诗歌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友开始表达对诸如抗争、尊严、阶级认同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主题内容的关注。这一方面归功于《大工地》报的意识启蒙，但更重要的是工友们在打工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感触到这套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对人的压迫与劳动的异化。只有从资本主义为我们描绘的虚幻的梦境中走出来，我们才能迈出劳工解放的第一步。

与以往对于《大工地》中规中矩的导向所招致的“办得挺好”这类评价不同，改版后的《大工地》也引起了工友不少反馈，主要的几类反应是：

“《大工地》写得真好，讲的都是大实话。”由此，这些工友成为《大工地》忠实粉丝，进而为《大工地》投稿，或为《大工地》进行小额捐款。

“这上面讲得是真的么？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这是不少工友在第一次接触《大工地》时的反应。此后，他们就会出现分化，绝大部分开始透过《大工地》思考自己的命运和出路。但也有人因此对我们疏远我们，当人长期处于一种低人权状态生存，并认为这是一种

正常状态时，我们引入的赋权体系最初遭遇的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反应。受资本主义成功学“洗脑术”的影响，有的工友坚持认为当今社会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合理性，漠视工人权益的正当性，将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污名化。

“你们讲这些都没用，没有人可以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有建筑工人会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有它的道理，我们在工地上几乎接触到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建筑工人，但有个别省份的建筑工人不团结、自我、见利忘义，是多年来我们在工地工作时比较难以团结的群体。

“你们说得好，有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吗？”这种质疑也并不少见，也是让我们不易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说：“我们解决不了。”那么，他们会指责你在忽悠人。我通常给报纸讲解员进行培训时说，遇到这样的质疑，你只需这样回应：“我能解决你的实际问题，只要我们商量着来做。”这不仅有力回应了他们的质疑，而且有了进一步深入行动的可能。

2014年，我去北京大学的工地去做活动，在一个工人宿舍里讲解《大工地》报纸时，就被一个30岁出头的工人好好“羞辱”了一把。待我们介绍完《大工地》的内容时，他回了我们这样一句：“这个工地再不好，至少我们有一碗饭吃。你有本事，你给我介绍一份好工作。”说完，没等我们回应，这个工人就摔门出去了。这位工友的思想在北京大学工地上不算少数，由于当前高等教育呈现“精致的利己主义化”（钱理群语）倾向，为高校服务的工人思想也受之影响较大，进步的学生社团和工人被视为异数。后来，一位四川籍建筑工人师傅给我讲，以前他们老家土改时斗地主，很多原来地主家庭的长工就很不理解，东家给我吃的，给我穿的，没有东家雇我们当长工，我们压根儿就活不下去。我们不知道去感恩，反而去斗人家，这不是人心被狗吃了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奴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至少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存在的，且多见于年轻的建筑工人群体中，他们受成功学的鸡汤奴化比较深，容易将社会的问题归结于个人的不努力，他们坚信是老板养活了工人，别人能当老板是因为别人比你能干。这就更凸显出我们进行劳动主义教育的迫切性。

从报纸发放来看，很重要的一点，发报纸人的身份其实影响着工人对《大工地》报纸的看法。《大工地》报纸的主要发放人员是高校的学生志愿者。改版后的《大工地》还重新整合了志愿者内部的不同思潮，让参与实践的同学在工地发放《大工地》、为工友解读《大工地》的过程中提升思想水平，且让思想更接地气。《大工地》报改版不到一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印刷合同还未到期之时，印刷厂突然提出要加价。我们对此进行了交涉，然后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大工地》已经成为印刷厂工人（包括保安）必看的读物，

由此引发了工人要求加班费的维权行动。一位河北邯郸籍负责印刷业务的班长对说：“《大工地》讲得都是真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人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大工地》印刷成本攀升，对此我们乐见其成。

随着《大工地》影响力的扩大，2015年夏秋之际，由于外部原因，《大工地》的发放体系遭到破坏。但六年来，以《大工地》为平台，我们网络了一批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建筑工人与大学生，六年前最早由建筑工友提出的“共产打工队”的设想而今得以付诸实施。其实，早在2010年，我们就与工友做过小范围的实践，30多名钢筋工人通过合作承包工程，取消包工头层级，从缩短工时、不参加劳动者不得报酬、集体学习、利润共享四方面进行实验，并引发了其他工人对建筑包工制度的斗争。此后，这种模式又在一个300人的小型工地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实践，也收到了不错的成效。

如果放在较长的时间轴上来考量，单从建筑工人给《大工地》的投稿诗歌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到工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诉苦、抱怨、自嘲，而能够更深刻地感知自己的身份、力量以及对未来工人命运方向的明晰。在工人行动的指引方面，《大工地》通过分享经验，传播知识，促进了工人群体更加理性和组织化的维权实践。这些经验的总结、问题的表露也通过官方的政策渠道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近几年国家在建筑业职业安全、劳资关系治理以及建筑业改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工地工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在工地做活动时，他们的脸上总是充满着各种不同的表情。）





（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们在北京海淀区保利·西山林语工地外的一块宽阔场地开始了又一次的工地活动，只不过这次工地文艺的主角不是志愿者，而是工地工友，活动名称就是“大工地诗歌朗诵会”，没有节目单，也没有事先安排好的演员，你既是观众，又可以做演员，这不，工友们已经自觉围好了场地，只待节目开始。）



（北京海淀区某工地，晚上去工地做宿舍探访时，遇到咨询劳动合同的四川工友，两个人的

讨论吸引了一家老小的关注。工地上普遍存在的劳动合同陷阱让工友很受伤，千万得小心里面的猫腻。拍摄者视角很独特，但这么经典的场景却把正在做咨询的我给省去了！）



（这是我们工友书屋中令人感动的一幕。一位河南籍工友在为另一名不识字的工友念读报纸上的新闻，这里没有歧视，只有互帮互助。为此，河南建筑工友刘付良赋诗一首《东南西北张王李赵》将大工地上五湖四海工人间的情谊进行了表达：山东省的张家哥，山西陕西王老弟。云南省的大个李，河北省的赵家弟。有缘相聚在一起，同为下苦除藩篱。精诚团结互帮趁，不惧邪风拨嫌隙。）





（这是我们在建筑工地上帮忙组建的一个工地合唱团，下工之后大家在一块空地上排练。合唱团成员没有条件限制，只要你愿意唱，于是，各种奇特嗓音的工友就夹杂在了一起。不过，幸好，在没经过专业训练、但“点儿打得还挺准”的敦金印师傅的指挥下，七零八落的声音，还算统一到了一起。）



（《大工地》报是我们专门面向建筑工友发放的非正式出版物，每一期报纸印刷出来后，我们都会去工地宿舍进行报纸的派送与解读。照片上，我们的美丽正在工友宿舍里为大家做《大工地》报纸的解读。）



（我们举办的大工地诗歌节上，左边的四川籍建筑工人何正文作为主持人，正在鼓励河北籍建筑工人谢仲成朗诵自己的诗歌，写了几十年的打工诗歌，第一次当众朗诵，谢师傅紧张而兴奋。）





（北京大学草坪上，我们的北大伙伴正与工地工友举行的小范围工人诗歌交流活动。）



（一场暴雨过后，我们在北京大学的工地书屋遭到水淹，待天晴之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帮忙晾晒书籍。）





(大工地外，霓虹灯下，我们的地摊儿成为建筑工地一带饶有特色的“文化摊贩”。)

### 三、让诗歌跳出小众的文字游戏

《大工地》报开创了当代建筑工人的诗歌表达，而这种表达像一场春雷，炸开了当代打工诗歌的晦涩与沉闷。虽然因环境原因，《大工地》报已于2015年秋停止发行，但大工地诗歌不断。幸好，我们还有诗可读。其实，任何一种诗歌都有它的读者群，抑或诗作者的立场已经决定了他的诗为哪一类群体所写，而这也不必然与诗作者的身份有关。

记得工人许立志自杀后，他的诗歌在一些文化和资本精英的支持和运作下得以正式出版，而且诗歌也被拍成纪录片形式进行了公映，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许立志像他之前的一系列自杀诗人一样，他们的诗歌在他们死后为更多人所知。但与文化精英和资本精英对许立志诗歌的追捧迥然不同的是，他的富士康工友们反映很平淡。

2015年，我曾带着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来到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与富士康工人进行读书分享。根据书籍的出版介绍，该书“汇集了许立志2010年以来所写的近200首诗，其中大部分诗作是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内完成的。……常以荒诞的或令人震惊的笔触书写悲辛的底层生活与幽深的死亡诗意，以此来为两亿多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然而，当我将一首首许立志的诗歌与富士康工人进行分享时，得到的最多回应是“看



不懂”，而“看得懂的又不像诗”，比如《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这分明就是一个关于“花生酱”的产品介绍嘛。最后，工人們的讨论焦点从对诗歌本身转到对同为富士康工人的许立志自杀的讨论，很多人唏嘘许立志“可能没有朋友”，他们非常清楚，在富士康做工，假若没有朋友是活不下去的。后来，从网上透露的信息来看，许立志真的朋友很少，只有他的阿嬷和一只叫阿黄的狗。我不由得惊叹工人們的直觉。

山东籍农民工扬尘（笔名）也是一名年轻的打工诗人，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在工厂打工，而后转到建筑工地做工，并成为北京行在人家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大工地》报“工人心声”板块的编辑。2015年因为工地开工量减少，他进入郑州富士康打工。在他看来，许立志的诗更适合知识分子来读，而不是工人。我读过扬尘的早期诗歌，跟许立志，跟很多从流水线上走出来的年轻打工诗人的诗作都很像。但如今，他已经完全不同于许立志，他已不是当年自认为“怀才不遇”的诗人，他来到富士康工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以文会友、以武会友，不仅结交了百名铁杆工友，而且领导成立了两个工人小组。

打工诗歌随着农民工进城的大潮，已经出现和发展了三十余年，但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努力融入主流的诗歌话语体系，无论从形式还是意象，不仅将抛弃了唐宋时代的传统诗词写法，也抛弃了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种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翻身诗歌形式，打工诗歌越来越千篇一律采用新诗形式来书写，而在诗风方面也努力融合了主流诗歌的荒诞风、朦胧风，似乎这样才能显示诗作者的水平。

与许立志年龄相仿的扬尘也曾经是像许立志一样的诗人，擅于写诗，也热爱写诗，但缺乏读者。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扬尘成为我们主办的《大工地》报的工人编辑，并在一年后成为《大工地诗歌集（第二辑）》的编辑主力。一年的时间里，他对工人诗歌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人民诗歌应该具备三个特点：只说实话、人民立场和通俗化。然而，这样的诗歌已经远离了我们很久很久。这正如扬尘在《大工地诗歌集（第二辑）》的序言中写道：

一个为文者，不管水平高低，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然而现实又有不同，对于占中国一半人口的工农，似乎并不是一些作者的假想读者，证据是，很多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工农生活毫不沾边。

我作为工人中的一员，深深的体会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鲁迅先生曾描写过一种病，叫做“因聋而哑”，就是说一个人本身不是哑巴，但是因为是个聋子，从小听不见别人讲话，还以为别人讲话不过是“嘴巴对着嘴巴动几下”而已了，时间久了自然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如今我们似乎又要落入这样的窠臼之中了。现实已经让我们不容易听到社会的声音，假如我们自己相互之间再不交流交流，恐怕真有人以为我们已经变成“哑巴”了呢！

幸而，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当我走街串巷，和广大工友接触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听”的途径虽然少，但我们毕竟可以“自言自语”，所以还不至于成为“哑巴”。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天长日久之后，我们的“自言自语”也逐渐的有了成就，这第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交流起来亲密无间。我们不但“自言自语”，说的人多了声音就开始大起来，我们还要把声音传得更远些呢！由我们建筑工人自己编写的诗集《大工地诗歌集》即将编印成册了，书中收录了三十七位师傅最近两年的诗歌。尤其“只说实话”、“人民立场”、“通俗易懂”的优点发挥出众，是难得的、真正的打工文学作品，必然成为我们广大工农的好朋友。

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依托《大工地》报的读者群，自2012年非正式出版第一辑《大工地诗歌集》以来，已经连续非正式出版了四辑《大工地诗歌集》。这些诗歌都是未经任何修饰的原生态文字，而这些诗歌的作者也都不是专业的“诗人”，甚至他们都不具备主流诗人所认可的基本条件。他们都是一线建筑工人，有的从十几岁开始在工地做工，到现在已经当了大半辈子建筑工人。但，就是他们，让诗歌走出了文艺圈和公益圈，让诗歌不再只是文化霸权下小众的文字游戏，让诗歌重回劳动者的世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仅仅从诗歌形式和所传达出来的诗风来看，建筑业农民工的诗歌就与我们所熟知的打工诗歌很是不同。比如，同是写工人下班路上的场景，打工诗人许立志这样写道：

晚风吹送着/在风里我听到一位小贩的叹息/一对情侣的欢笑/我听不到日子的逝去/  
人行天桥上走过更多的我/心藏疲倦，又携带希冀/霞光在眼里溢出来/像盐水，又像彩虹/  
我像一位送水工/在路灯下，扛着落日回家

——许立志《下班路上》

而来自河南登封的建筑工人释嵩则这样写：

日落暮色浓，收工归帐篷。  
风来知了乱，草里蟋蟀鸣。  
悠悠胡琴荡，渐渐同乡逢。  
谈唱不知时，衣衫觉露重。

——释嵩《暮归》

同样描写打工者被现代城市生活的排斥与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困境，打工诗人许立志这样写：

在城市漂泊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自己像一位古人/穿梭在霓虹灯下，而头戴斗笠/在  
酒吧门口，我看见一座寺庙/在肯德基，我暗叫一声/“掌柜的，小二”/在KTV我唱着/“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夜晚，在线装古籍中/我侧身躺着/和一个词，和一首诗/相拥而眠

——许立志《古人》

而在河北籍建筑工人胡庆柱眼中，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表达则是这样的：

进城难辨南与北，全是好东西，天灰路塞人如蚁，聚散离合转瞬似游鱼。  
广厦林立千万间，寒士难欢喜，帐篷板床地下室，何人蓬头破衣在这里。

——胡庆柱《虞美人·苦逼的》

关于亲人，关于远去的故乡和乡愁，许立志这样写道：

在黄昏里飘散的/没有根的回忆/把我一次次带回故乡/纯粹而自然的乡音/遍布我皱纹四起的眼波/目光里沉淀的都是亲切/我的亲人们/在风中坚持劳作/以汗水浇灌稻田/庄严而神圣的劳动者/他们坚守生活，一碗水的贫苦/谁也无法剥夺落日下的影子/锄头一挥间/来年的收获又可以携来幸福/多少年了，站在乡村的边缘/我是被落日照耀的孩子/总在心里默念/我爱你们，我的亲人

——许立志《我爱你们，我的亲人》

而在建筑工友“孺子牛”的笔下，乡愁和别离是这样表达的：

日落西山近，霞染枫叶红。风吹深秋至，梦送游子归。谁知游子心，唯有孤影随。

——孺子牛《乡愁》

别离之情，是建筑工人诗歌表达的一个重点内容，他们既有如上面这首词般的温婉，也有的如下面这首诗歌般的炽烈：

独在异乡为异客，打工生涯真坎坷。每当孤独寂寞时，想家想儿想老婆。

——李正阳《流人》

同样描写资本主义大生产将人的劳动异化，关于生产过程，诗人许立志这样写：

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湖北籍建筑工人刘德子同样以比拟的方式描写他们的生产过程：

上班欢过下槽的马，下班难比卸套的牛，一天到晚13个点，浑身上下热汗流，不如马，不如牛，来世遭恨千秋。

但紧接着这位建筑工人笔锋一转：

我是一颗葱，被剥许多层，原本白胖的身躯，却露出了清瘦的原形。世间谁这么可憎，下手这样的绝情，等你再吃我时，以气刺进尔的鼻孔！

当然，作为打工仔的许立志也不是没有想过抗争，他在一个夜班后写了《杀死单于》：

每个夜班过后/偏头痛就会悄然降临/为此我苦恼了整整三年/直到今天早上/我感到太阳穴里绷紧了/即将发射的弓箭/这个早上我不再是低着头颅的打工仔/我是抬头挺胸的汉朝将军/誓以最后一箭/洞穿匈奴首领的胸口

——许立志《杀死单于》

但作为诗人的打工仔许立志只是在诗中想象或意淫了一下这种抗争而已，一个在流水线上没有朋友的人，除了以意淫或自杀的方式抗争，还能怎样？他们不会像建筑工人那样敢想敢干，比如湖南籍建筑工人曾宪彪的这一首《讨薪词》：

任凭风吹火烤/竭尽全力养家小/白发双亲可好/背井离乡数月/囊中不见分毫/并非不孝/工钱确实要不到/呼天不应求地也徒劳/钟馗卦一梦/磨双刀/血染六里桥。

这首诗词是一个动员令，曾宪彪和他的工友在第二天就将诗作内容付诸实践。结果，工人胜利了。

关于现实与梦想的矛盾，许立志不是没有思考过，所有底层打工者都面临现实的苦楚与难以触摸到梦想的苍白，许立志在《梦想与现实》中写道：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发呆/我说我没发呆/我在畅想未来/他们说/你那也叫畅想未来/你那他妈叫做白日梦/要不就是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我懒得跟他们争辩/继续畅想未来/我总觉得/在畅想的时候/灵魂会被梦想带走/留下我的身体/被一截又冷又硬的现实/洞穿

——许立志《梦想与现实》

许立志在这首诗中的表达更像是孤傲的呻吟，相较于许立志的表达，甘肃籍建筑工人李田天的这首《候人》更能洞穿新自由主义所赋予打工者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虚妄。

北风呼呼地刮，哆啰啰哆啰啰，脚手架上直哆嗦。

哆啰啰，哆啰啰，天天在垒窝，安乐窝里不是我。

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天天在垒窝……

北风呼呼地刮，大雁南飞我南下，

南下广州、深圳、海南岛，去旅游去度假？

笑话！太阳给我供暖，省了取暖费，多挣几毛钱……

来年春暖花开，大雁北飞我北上，

北风凉快，少中暑，少生病，少花钱，多上班，多挣钱，多垒窝。

我是泥瓦匠，天天在垒窝，

我垒的窝，冬不冷，夏不热，是个安乐窝，安乐窝里没有我……

我没有梦想，我没有翅膀。

我不是天上的候鸟，我是地上的候人。

——李田天《候人》

建筑工人的诗歌形式多样，包括律诗、绝句、古词、现代诗等体裁形式，语句大多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的诗歌表述诙谐幽默，读起来更像是“打油诗”的感觉，但在内容上真切动人，贴近实际生活，表达了工人心声，引发共鸣。他们的诗歌乐观但不空洞，没有虚妄的鸡汤成分；他们的诗歌也不是一味的诉苦和呻吟，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黝黑的面孔、粗陋的大手和雄壮的肌肉中所振发出来的力量。重要的是，这是工人能够读懂的打工诗歌，不仅能读懂，而且因其形式活泼、上口而被背诵和传诵。真正的工人诗篇，不应是诗人自己的自哀自怜，在立意上，它应成为劳动的号子，战斗的号角；在传播上，它应成为劳动的诗篇、大众的诗篇。

建筑业农民工，这一农民工群体中庞大而沉默的群体，他们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工人文学的另一种文本，召唤久违的人民诗歌，为我们指明了劳动文学的发展方向。于是，大工地诗歌节应运而生。

大工地诗歌节的诞生，对于我们这个重点业务并非工人文化的公益机构而言，实乃是活动的副产品。2009年，为向建筑工人宣传和讲解相关法律政策，我所在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了非正式出版的《大工地》报，为便于和工友互动，我们在这份四开的小报上开辟了一个只有豆腐块大小的“工友心声”专栏。没想到，这一栏目的设置引发了建筑工友极大的投稿热情，七年时间里我们收到了建筑工人投给我们的千首诗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难眠的深夜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给我们，其中仅四川籍工友向宗伦、张峰，山东籍工友王运朋投给我们的诗歌作品人均都超过了一百首，但限于报纸篇幅原因，无法一一登载。

为了扩展建筑工友向公众的表达空间，我们开始酝酿举办一期大工地诗歌节活动。活动选在2012年5月1日劳动节。我们之所以把大工地诗歌节活动选择在五一劳动节当天，除了劳动节对于劳动者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外，这对于建筑工人来说也是有着特殊的行业意义。因为在全国各个行业都已经普及并严格执行五一休假权的大背景下，五一带薪休假的争取对于建筑业农民工来说，仍只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我们寄期望通过在五一这天举办诗友会的方式，与建筑工友一道争取五一带薪休假权，与底层的劳动者一道聆听底层的劳动者声音，



共同分享下苦人的体历，以此纪念劳动者的五一，奠基建筑者的尊严。

活动为追求社会影响力，起初将地点定在了北京大学，但天不助人，在活动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我们接到校方通知，要求活动取消。我们只得仓促将场地调整到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一个城边村中进行。

四十余名工地上的打工诗人从北京及周边地区赶赴活动现场，其中一半以上的工友都是从 30 公里以外的工地赶来，更有工友从早上 5 点钟就开始赶车过来参与。但我们之前邀请的知识分子到场者则寥寥无几，高校老师只来了四名，媒体记者全部缺席。原本打算让知识分子们听听建筑工人的声音，结果场面如此惨淡，作为活动的主办方我难掩失落感。但建筑工友们似乎不在乎这么多，既然耽误一天干活的工钱都不要了，大老远跑过来，即便是自娱自乐也要玩得尽兴。于是，我们的大工地诗歌节就在这种混乱与惨淡中拉开了帷幕。

为了营造活动气氛，湖北建筑工友刘德子特意为本次大工地诗歌节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建高楼楼高千米寸铁寸土全是农民工奠基**，下联是：**筑大厦厦有万间单间套间可有劳动者半间**。横批是：**劳者何所获**。这既讴歌了建筑工人的劳动价值，又表达了现实中建筑业农民工群体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一首《自嘲》更是对应当前热炒的一个话题——关于要不要改变“农民工”这一称呼的问题，王师傅以一个建筑业农民工的视角表达了广大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冷眼斜视是世风，莫道不与往日同。自慰身份得巨变，盲流终成农民工。**”王师傅 20 世纪 80 年代来城里打工，一开始的身份是“盲流”，21 世纪初身份发生了变化，他和他的伙伴开始被称为“农民工”，而实际上他们感觉称呼变了，但所享受到的待遇却没有什麼变化，甚至比八十年代还要差，就拿建筑工地的工资问题来说，八十年没有拖欠工资的问题，而今，工资拖欠已成为建筑业的常态。现场的四十余名建筑工友中，只有一人没有工资拖欠的经历，即便这种不拖欠也不是法定的按月足额发工资，而是年底结清。现场有工友发言说：“如果没有农民工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提升，农民工这一称呼改与不改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按照建筑工地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路，吃的是最差的，住的是最差的，就算是管你叫皇帝又有什麼用呢？”

王运朋工友的一首《自嘲》引起了大家对农民工身份的强烈共鸣，河北工友谢仲成一首《“快”与“块”》更是形象表达了建筑工地的伙食状况：

**食堂厨刀真叫快，一条小鱼切五块。每份都要卖六块，民工饭票少得快。**

**肉片薄如玻璃块，每片也要卖五块。三口两口咽得快，到了肚里消化快。**

**食堂进账无数块，老板赚钱来得快。可怜民工心不快，怨声载道恨这块。**

谢师傅的这首歌刚刚念完，立马得到了北京某工地总施工单位安全总工杨最革的回应，他说：“有的工地食堂厨师的刀功真的很好，电扇都能把肉片吹跑。”他接着说：“在建筑行业，工资变饭票的情况比比皆是，食堂由老板开设，老板以自制饭票代替现金的发放，而工人因拿不到现金，就失去了自由选择吃饭的机会，他只能在老板开设的工地食堂中用饭票打饭吃，而往往工地的食堂饭菜，不仅价格比外面高出许多，而且味道也逊色不少。最后，在年底结工钱的时候，老板直接把工人的饭票金额从工人工资中扣除，这就是建筑工地的通用潜规则，工人们都管这种现象叫‘二次榨取’。”

河南建筑工友龚光志是一名有着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都与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上世纪70年代当兵就在北京参与西山的工程建设，1986年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国企工人。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下岗后的龚光志师傅彻底从优越的国企工人沦落到农民工的队伍中。龚光志师傅讲到1997年冬他在北京首钢工地干活儿时，半夜里遇到收容遣送站来查暂住证，结果他和工友们怕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当年很多因无暂住证被收容的人员都会被拉到昌平区卖苦力），在寒风中穿着裤头就四散奔逃。从国企工人堕落到农民工群体的龚师傅当初就特别感慨，而今，经过十五年的建筑业农民工生活，他对这一群体的整体生存状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虽然不断强调自己曾是一名国企工人，但如今他更认可自己的身份则是——农民工。他的一首《打工四季歌》道出了建筑业农民工漂泊而无奈的生命和灵魂——

春天到来春风刮，我们离开家。北京、西安、哈尔滨，重庆、贵阳或长沙。哪有简易房、哪儿有吊塔，哪里就是我的家。

夏季到来夏雨浇，我们四处飘。烈日暴晒身脱皮，蚊虫叮咬不在意。为了多挣钱，为了养儿妻，不惜筋骨血与泪。

秋季到来秋霜降，我们心更凉。子女学费一夜清，医院更是阎王账；万儿八千不耐用，物价飞涨我心慌，今年没希望。

冬天到来冬雪飘，我们心已焦。破衣破裤破棉袄，脚手冻伤钱难要。劳动仲裁成本高，诉求法律价更高。试问苍天和大地，“和谐何处求？”“公平哪里找？”

龚光志工友的一首《打工四季歌》引发了众多工友对漂泊生活以及有家不能相守的感慨，已做建筑工人十余载的王中保工友一首《思乡曲》深刻表达了漂泊的打工生活所带来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秋雨连绵泪如丝，夜夜思乡人静时。漂泊十载艰辛路，满目沧桑谁人知。”河北建筑工友李正阳的一首《流人》则更直白的表达了异地生活所带来的生活困苦

和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打工生涯真坎坷。每当孤独寂寞时，想家想儿想老婆。”

飘忽不定成为建筑工友们诗歌中不变的主题，在听完工友分享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老师说：“工友们有关漂泊和思想的诗歌特别多，其实，大家只要留心的话，打工歌曲中有关思乡的也特别多。为什么农民忽然多愁善感起来？这不是我们个体的原因，而是一个大的社会结构的问题，农民工进城打工，因种种制度限制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尴尬境遇，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家庭分裂现象。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以及飘忽不定的打工者，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农民工不是一个称呼的词，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歧视。有工友谈到要关心家乡，以后干不动了也要回到家乡，这没什么问题，可是在座的不一定都能够回到家乡。家乡的土地已经不能养活自己，建筑工人也养活不了自己。表面现象这和我们微薄的劳动所得有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和一个个家庭被撕裂，无法享受城市待遇，与和平时期最大的分离现象是有关系的。”

当然，五一节大工地诗歌会不止是一个诉苦会，虽然建筑工友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要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工友在探讨建筑业农民工未来的出路，有过希冀，有过碰壁与失望，但也有在挫折中找到自己最终的努力方向。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甘肃建筑工友李田天的一首《代表》就真实表达了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痛心以及对现今人民代表脱离人民的批评：

你会代表，我会下苦，

你会开会，我会打工。

你代表我开会，我代表你下苦。

你代表我吃菜，我代表你喝菜水。

你代表我吃肉，我代表你啃骨头。

你代表我喝血，我代表你献血。

你代表我吃糖果，代表不了我吃苦。

你代表我开会，代表不了我下苦。

你代表我按需分配，代表不了我汗流浹背。

你代表我在天上人间，代表不了我睁着眼摸石头过河。

你代表我在人间天堂，代表不了我在人间地狱。

你在滥竽充数的岗位上滥竽充数，我在出力挣钱的岗位上出力挣钱。

我代表你称职。

代表，辛苦了！

河北工友谢仲成的一首诗歌《冷眼》则表达了他这些年打工的阶级体验、情感与思考：  
经济已成鸦片，金钱蒙蔽双眼，阶级已经淡忘，斗争已成笑谈，一切向钱，向钱。

剥削的人有了原野沃土，生活的糜烂成为他们的乐园，宽松的环境使他们得意忘形，公开和社会叫板。

他们可以张牙舞爪，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他们露出的是狰狞的嘴脸，他们干的是伤天害理。他们可以对劳者说：想干就干，不干滚蛋！榨取你们的血汗应该，完工欠薪理所当然。

弱者无理可讲，屈者何处申冤，又有哪个敢讨要工钱。看朱门酒肉，有谁知背后隐藏多少辛酸？

严峻的形势不容乐观，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为平等我们必须斗争，为解放我们应该奋战，我们决不允许剥削死灰复燃。

我们的呐喊，一定要让剥削者闻风丧胆。朗朗乾坤岂容黑暗，历史车轮怎能倒转，劳动者的飓风行动，既能拨云见日，亦能将世界改变。

在谢仲成师傅读完他的诗作后，大家纷纷对建筑业农民工的出路做了一些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刘忱老师点评道：“对当前农民工群体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平待遇，我也很愤怒，我们的劳动价值需要得到肯定和尊重，而这种价值与尊重不是依靠谁的赐予，而是我们的争取。现在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我们就是星星之火，我们要相信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老师则从文风和字意两个方面谈了对这次诗歌节的感受：“首先，我想说这些诗写得很好，很多诗歌都有这一种唐风宋韵的味道，包括大家念的王中保的《思乡曲》。赵师傅写的《思乡》‘春夏复立秋，异地尽乡愁，望穿故乡地，思归岁悠悠。’释嵩工友写的《暮归》‘日落暮色浓，收工归帐篷。风来知了乱，草里蟋蟀鸣。悠悠胡琴荡，渐渐同乡逢。谈唱不知时，衣衫觉露重。’这些都体现这唐代名家孟浩然、杜牧的诗态。另外，从诗歌所传达的诗意来说，不是建筑工人，绝对写不出这样真实的诗歌。我们不论做学问的，还是打工的，都得思考的。很多诗都是有思考的，我觉得非常有力道有深度。我们需要将这些诗、手稿出版，让很多人都能够看到。我们自身境遇的改变，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还要引起整个社会对我们这个群体观念的改变，我们要发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阳和平老师根据自己在中国和美国做过工人的经历，谈到了对当前农民工问题和出路看法：“大家的诗歌让我想起了一首老歌《咱们工人有力量》。歌里面描述的都是我们的工作，那里面可没说我们是农民工、新市民，我们是工人！你们就是工人，

跟别人有什么差别。现在的人都不愿意用自己本来的称呼了。标签是骗人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按照我们谋生的手段，靠什么？我们是做买卖的？生意的？还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就是工人！为什么工人阶级变成了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改变不能依靠别人，我们地位的改变是要依靠我们自身阶级意识的觉醒、我们完整的工人身份和公民权，而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 四、大工地的诗意江湖

自 2012 年我们举办第一届大工地诗歌节至今，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工地诗歌节，而且都会非正式出版一本面向建筑工友们发放的《大工地诗歌集》。我们将这些诗歌按照所表达的主题分为四个类别：（一）离愁别意；（二）怨愤不满；（三）自我认同；（四）批判抗争。当然，这一分类并不是严格的泾渭分明，但为了便于赏析阅读，姑且这样来分。

但我们首先要回答人们的一个疑问：“建筑工人为什么要写诗？写给谁看？”很多建筑工友的回答简单质朴“就是有写的冲动”，“不写睡不着觉”。至于写给谁看？首先是写给自己，并与周围工友分享，如果能被其他工友插科打诨地叫声“才子”或“诗人”，更是美在心里、笑在脸上。

福柯讲话语即权力，诗歌作为最古老的一种民意表达方式，向来为各个历史阶段的劳动人民所采用。古已有“诗言志”之说（《尚书·尧典》），有“兴观群怨”之说（《论语·阳货》）。诗歌是一种言说，抒胸中之志，发心头之怨。诗之所以为诗是在于它的言说和表达，在于它是人的情感抒发，而不仅仅在于文字的华美、节奏的铿锵。

### （一）离愁别意

农民工进城打工形成了中国和平时期最大的家庭分离现象。春节期间，媒体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讲到农民工春节返乡时，与在乡村留守的孩子之间已是“再见已陌生”。根据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截止 2010 年，全国留守儿童 6000 多万，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一孩或两孩，那么这就意味着至少有三四千万的家庭处于家庭分离的状态。2016 年春节，中央更是出台政策来对留守儿童问题采取措施。

而在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中，这种现象的表现更为明显。他们不仅与孩子分离、与父母分离，与其他农民工群体相比，他们还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2013 年，我们对全国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状况进行了抽样调研。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在建筑工人高达 97% 的已婚群体中，常年与爱人一起生活的仅有 18.1%。



河南籍建筑工人魏锡宝的一首《自嘲》很直白地写出了建筑业农民工高强度劳动以及家庭分离的辛酸：

建筑工人工资低，粗茶淡饭穿破衣。一年吃得三年饭，三年陪了一年妻。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用的《夜思》，也表达了这种离别与思乡之情：

耳畔喜闻琴弦声，字亲音切动我情。不恋他乡阑珊夜，尤念故地月照明。

还有河南建筑工友释嵩所写的两首词：

#### 《卜算子·赠燕》

金风生玉露，料定留不住，苦无双翼同千里，独自寒冬度。

嘱咐征程路，莫把我眷顾，芳香绿染容易逝，别让归期误。

#### 《卜算子·蟋蟀》

有多少凄楚，彻夜相倾诉。相逢总会别离处，自然有归路。

走向未来路，好时无风雨。尽情一醉释重负，今生悔却无。

春节过后，中国劳动人民又不得不面对短聚后的终年分离，释嵩师傅的一首《春日别乡》不知搅碎了多少人的心：

离家孤北上，窗外正夕阳。

风寒麦苗弱，霜凄老树苍。

暝色淹晚霞，飞鸟向何翔。

又是千里外，飘零路何长。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系研究生王超在对这首诗解读时，这样写道：“读罢这首诗，仿佛看到了一个孤寂的身影，在一个早春的傍晚，收拾好行囊独自踏上北去的列车。这位工友通过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一连串的意象编织成一幅离乡的画卷。本是草长莺飞的早春时节，而通过这位工友的眼睛，我们却仿佛看到了马致远《秋思》般的寂寥，一组组凄婉的意象逐个闪现在离乡人的眼前，而在这些意象的背后所蕴涵的则是整个家庭的酸甜苦辣。那柔弱的麦苗和苍凉的老树不就好像家中的幼子和年迈的双亲吗？离开了诗人的庇护，他们又将怎样抵御那无情的‘风寒’和‘霜凄’？而诗人自己却也像那只飞鸟般飘零无依，远飞千里之外。……这些人生遭际，出现在诗歌里，就是迷茫、飘零，还有孤独和忧伤的情绪。这种表达方式借用了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所常有的那种诗歌意象，却把它转换成普通劳动者熟悉的那种对应物，如‘麦苗’、‘老树’，这些意象寄托着明显的底层劳动者的感受。”

## （二）怨愤不满

建筑工地上一直被媒体被炒作的“高薪”：“搬砖的月收入过万，秒杀白领。”其实，

这真的只是一个传说。根据我们 2013 年的调查，建筑工人在工地上能够务工的时间只有 6.5 个月，工资平均下来是每天 160 块钱，一年能做工的时间只有 155 天。由于天气原因和工地管理的问题，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过去的 2015 年、2016 年状况更差——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房地产不太景气，但是由于能源过剩，所有的建筑材料成本都在下降，公司也趁机压榨工人的工钱，所以建筑公司的利润是在增加而不是在下降。但是这两年拖欠工资的事情不降反升。可是现在都很少听到有工人讨薪，为什么？用人单位趁机利用经济危机工人找工难的买方市场——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为了下一年能够继续找到工作，没有像前些年那样很有底气地讨薪，所以到现在很太平。根据我们 2013 年的调研，经过讨薪能够拿到工资的比例只有 60%，另外还有 10% 的建筑工人分文没有拿到，也就是说中国六千万的建筑农民工当中，有六百万人一年下来颗粒无收。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2015 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达到 1%，人均被拖欠工资为 9511 元。

河南建筑工友吴伟的一首《打工苦》使其中苦楚跃然纸上：

打工苦，打工苦，领工凶似虎，吃饭嫌吃多，干活儿嫌太少，工资不给足。气死吾，气死吾。

打工苦，打工苦，寒风直透骨，夏天汗如注，下雨还打混凝土，风吹木板打住我屁股，疼死吾，疼死吾。

打工苦，打工苦，想了老婆想爹娘，想起娇儿泪两行，家里的井水凉又甜，外面的饭菜吃不服。你何苦，我何苦？

这毫无底线的欠薪，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没有看到过的。给资本家干完活、被剥夺了剩余价值之后，连工资都不给的现象，或许也是我们的特色吧。建筑领域整体行业性欠薪已在中国风行三十年，至今都没有根本改观。所以，对于建筑工人而言，好不容易拿到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为了要挤火车，钱不被偷，还要把钱放在内侧的衣兜里面缝起来。说到返乡，建筑工友们也是一肚子抱怨。自 2014 年 12306 可以网上购票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好事，但是对于农民工来说惨得不得了。白领们抢票都很难抢到，你想想，让缺乏网络资源的建筑业农民工如何去抢票？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在寒冬腊月的一个雪夜，背着沉重的包裹返乡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野旷雪重映钩寒，一载飘摇人终还。小儿不知劳夫苦，笑解兜囊数新钱。

建筑工人的怨愤很多，除了欠薪这一顽疾，工作生活环境的糟糕也是民怨很大的事情。

如安徽建筑工友陈辉的一首《臭水沟》：

臭水沟旁沟水臭，臭沟水中水真臭。沟水臭得行人醉，只把工地当臭沟。

建筑工友张动师傅的一首《炼狱》：

烈日炎炎象火烧，汗流浹背胜水浇。工地就像监牢狱，宿舍好似烧砖窑。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的《工房》：

墙面有洞送花香，床板无席壮脊梁。夜读自愧少金眼，游园不敢羨鸳鸯。

以及，两首批判工地食堂的诗歌：

食堂见闻一

一窗难就队如龙，师傅悠闲手似虫。

前人饭后八百里，后者尚待夜三更。

食堂见闻二

语音杂喧人如流，不得荤腥却见油。

问汝已啖饭菜香，诘我可知鬼见愁。

### （三）自我认同

虽然在社会结构上，建筑工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卑微和一无是处，他们有对自己劳动的认同，有自我的觉醒。

四川籍工友向宗伦的《建造》表达了工人对自己劳动价值的尊重和认可。

华屋生辉耀光明，劳工心血建造成。

大厦拔地接日月，高楼矗天摘辰星。

彩虹横贯江渚上，天堑跨越南北行。

昔日荒凉村外村，如今闹市城中城。

河南建筑工友刘付良一首《东南西北张王李赵》将大工地上五湖四海工人间的情谊进行了表达：

山东省的张家哥，山西陕西王老弟。

云南省的大个李，河北省的赵家弟。

有缘相聚在一起，同为下苦除藩篱。

精诚团结互帮趁，不惧邪风拔嫌隙。

而云南籍建筑工友喻大鹏在上海工地的工作间歇、在高高脚手架上用手机给我们发来了一首《上海滩》，则将建筑工人的雄壮之美和乐观精神推到了极致：

一层沙浆一层砖，哥们盖楼上了天。

望着彩云擦把汗，对着太阳抽支烟。

人言都说打工苦，我把苦来当磨炼。

怒发可冲凌云志，双手擎起上海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王超指出了这首诗歌唱出了劳动之“雄强壮美”：“天空”“彩云”“太阳”，前两联的这三种意象给人以高远、美好和充满希望的感觉，显示出这位工友将自己的理想直指霄汉的雄心壮志。颌联仿佛营造出一位充满阳光的年轻人形象，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年轻人在创造着一个个中国奇迹。诗人“我”将人人都认为的“苦”视作是一种磨练，有一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气概，这种坚忍不拔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传统，也是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尾联化用了岳飞《满江红》中的“怒发冲冠”一句，尽显英雄豪气，结尾处“双手擎起上海滩”突出力量之美，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美之极，即雄强之极。”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柔美与浮华，而真正能擎起这个时代和国家的双手是需要有力量的。

这正如我们在《大工地诗歌集》（第三辑）的编辑按语所写：劳动者的生活是一种信仰，所以劳动者总是最坚强。

#### （四）批判抗争

《大工地诗歌集》中描写当代农民工生活工作中的种种矛盾的作品笔调真挚，对于农民工所处的病态社会环境做了批判和讽刺，有些语句蕴意深远，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入木三分，是不可多得的好诗。

河北籍建筑工友阿龙的一首《穷与富》道出了财富积累与阶级压迫的本质：

假如没有我的穷，哪里会有你的富？

假如没有我的苦，哪里会有你的甜？

假如没有我们的双手和汗水，

哪有你们舒坦的华屋与豪车。

然而，你却笑我无知，

我看到，你笑得如此无耻。

我问，勤劳不是可以致富吗？

你说，你们勤劳所以我富啦！

原来，在资本的统治下——

劳动就这般被扭曲和践踏！

再如河南建筑工友刘付良的一首《摩登时代》：

天上塔吊不停转，地下电钻叫得欢。

木工钉锤如擂鼓，铁工扎勾飞快转。

生命如同流水线，肉体流转化作钱。

幢幢彩楼矗天起，湮没民工血泪汗。

以及他的一首《华盖运》：

运交华盖心情沉，如似行船失航轮。

无耐世事多有变，背运压身几丢魂。

幸福生活难实现，啥时笑迎福贵神。

常言富贵勤劳换，缘何劳者终清贫？

河北建筑工友谢仲成的一首《充电难》则找准工地上劳资力量的博弈点，以诗为武器，成就了一出工人抗争故事。

红帽充电不用忙，高压插座屋里装。

电器一插电闪烁，手机时刻都通畅。

民工充电着了慌，东奔西找是瞎忙，

手机没电通讯断，着急生气心不爽。

一个工地两个样，阶级划分理难讲，

只许州官把火放，百姓点灯你甭想。

电线插座被没收，看谁还敢再犯上，

公司应树好形象，以身作则是榜样。

群众呼声要倾听，民工冷暖要常想，

转变作风办实事，尽快督建充电房。

谢师傅自述道：在这个信息时代，手机作为建筑业农民工与外界沟通的首选通讯工具已经普及。然而，很多工地不为民工着想，佩戴红色安全帽的管理层配置着全天开放的空调和电脑，却以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之名不为我们这些佩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宿舍安装插座，使得民工为充电而发愁，大家怨声载道，但又忍气吞声。我将这首《充电难》的诗歌打印出来贴在了工地食堂门口。到了中午打饭的时候，工友聚拢起来争相观看（其中也有戴红帽子的管理人员），对工地管理方的咒骂与抗议很快成为一股浪潮……到了晚上，我们的充电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在建筑工地上有不少以诗词为武器向资方抗议和团聚工友的故事，前文已登载的《讨薪词》也是其中之一。与其他打工诗歌相比，建筑工人经过多年的岁月磨砺和积淀，使得他们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怒而不怨、哀而不伤”的格调。他们不怨不悔，勇往直前！

作为《大工地》编辑工作的组织者，大工地诗歌节于我而言，是一种尝试，一种向外界传达另一种独特的诗歌文本的尝试，虽然它的传播范围是如此之小，但却有建筑工友在场、认可与传诵。在这些文本中，我们看到建造了无数高楼大厦、楼堂馆所的工人们，试图建造另一种更具永恒价值的东西——平等与尊严。

我特别感谢每位工人师傅的辛勤耕耘，他们不仅是一个个普通岗位上的劳动工具；当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放置于工友、公众的面前的时候，就标志着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被动、沉默中醒来，走向主动、发声的跨越性变化。他们的声音不仅粉碎了社会上形成已久的“工地民工没文化”的刻板印象，更像春风一样扫过工人阶级沉闷的大地，带来新的希望，让漫无头绪闷头苦干的人们听到一个久违的春雷。这些诗歌让我们看到：

建造建造者的尊严，不是令行禁止那样简单，更不限于令行禁止。

与建造者建造尊严，不是恩悯怜惜那般简单，更不限于恩悯怜惜。

建造者建造的尊严，不是太阳那般预定升起，但会形成于自身中。

总有一天，一切颠倒了的常理，必被颠倒回来。

## 五、为自己而存在

一

我是泥瓦匠， 打工工地上，  
高高脚手架， 是我工作的岗。  
拆东墙补西墙， 是我老本行，  
蘸着水泥浆， 砌起大楼房。

二

劳动的高强， 累得我够呛，  
没油花的菜帮， 盛满我饭缸。  
饭后的午休， 我垫张报纸躺，  
顾不得沙尘扬， 马路是我憩息的床。  
马路熙熙攘攘， 马路车来车往，  
你轻蔑目光， 不经意把我灼伤。  
你是觉得我， 不配留在你的家乡？

你是怪罪我， 辱没大都市的风光？  
睡路可能不当， 可我真是没别的选项，  
快要累瘫的我， 已听不到汽车喇叭响。  
我确实要躺躺， 恢复午后劳作的能量，  
没事谁会这样？ 我有我的委屈一箩筐。

### 三

歇工的时候， 人群里阅读女孩的脸庞，  
儿时的玩伴， 如今， 她的孩子已有我这么高长。

三十多的我， 至今还是光棍党，  
不可及的事， 只能心里默默想。  
记得张二江， 他有女人一百单八房，  
我这泥瓦匠， 难道要当一辈子和尚？  
同一世界上， 有人太繁荣我太荒凉，  
人与人之上， 情况为什么如此异样？  
我总是很忙， 加班加点地砌墙，  
我总是很忙， 没完没了地盖房。  
一年的工饷， 换不来自己盖的一平方，  
十年的砌墙， 换不来属于我的一张床。  
我是泥瓦匠， 害怕夜晚的无聊时光，  
我年轻力壮， 没媳妇的日子有时让我抓狂。  
工棚的铺板， 凌晨还在咯吱咯吱地响，  
无边的黑夜， 掩盖了我无尽流血的伤。

### 四

老家有位姑娘， 说愿做我的新娘，  
一次锥心的痛， 她犯傻跳进水塘。  
怪我这泥瓦匠， 没能替她把风雨挡，  
遗书让我悲怆， 情债她说下辈子偿。  
她还有别的设想， 说不在乎进天堂，  
来世最好做只鸟， 自由地在天空飞翔。  
农村人生活的苦， 从来没有谁来帮，



我没做成新郎， 婚姻从此成了奢望。

五

没劲透顶这半生，到底值当不值当？  
我投世的这一趟，本身就是一场悲伤。  
不怪生我的爹娘，就怪自己投胎不当，  
我是要继续坚强，还是该向命运投降？

贫瘠的家乡，像一座清冷的坟场，  
贫瘠的家乡，像一个废弃的战场。

留不下青壮，容不下姑娘，  
要想找出路，就得满世界闯。

六

我是泥瓦匠，祖国也是一个泥瓦匠，  
她咣咣当当，拆得我家乡遍体鳞伤。  
失血的家乡，成了滋补大上海的营养，  
失血的家乡，成就了上海的富丽堂皇。

七

我有一位兄长，最近遭了大殃，  
一把电焊的火，送他进了牢房。  
说他无证上岗，说要提审公堂，  
一张红戳通知，把亲友心浇凉。

以工价衡量，建筑工是个贱如白菜的行当，  
可出了状况，卖白粉那样的重罪得我们扛。  
如何去补偿？我兄弟会不会成替罪的羔羊？  
搞什么名堂？有没有人欺负我爸不是某刚？

八

你总牵着狗儿逛，我总在脚手架上晃。  
你的生活像蜜糖，我的生活这么没指望。  
我曾讨薪如打仗，我曾暂住被扣在联防。  
我曾因一张车票，差点把兜底掏光。

九

祖国呀祖国，你说你是我的亲娘，  
你编好曲儿，从小教我唱。  
祖国呀祖国，我的命运谁在裁量？  
谁铁石心肠？谁把我心伤？  
祖国呀祖国，我不想生活再这样，  
祖国呀祖国，我对幸福也有渴望，  
祖国呀祖国，给我人生指个方向。  
你说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芒！  
我要看到光芒，我想活出人样！  
我要看到光芒，我想活出人样！  
祖国呀祖国，我要看到光芒！  
祖国呀祖国，我想活出人样！

——湖北籍建筑工友郑槐生

郑槐生工友这首自传体诗歌《泥瓦匠》是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写照，是我最喜欢的诗歌。

他们，带给了城市什么？他们，又从这个城市带走了什么？

他们建造了人们的家，他们清扫了人们的院落和道路，他们创造了我们生存的这个城市。他们带给我们安心，带给了我们舒适，带给了我们温暖。

他们带走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住宿和工作记忆，他们带走了“开水煮白菜”的饮食恐惧，他们带走了那一个个工伤之后的伤心和悲痛，他们带走了拿不到工资时的无奈，发钱回家时的兴奋。除此之外，他们还能从这个城市带走什么呢？

他们建造了城市，但城市却不属于他们；他们建造了繁华，却无法享受繁华；他们带来了发展，却无法实现自我发展；他们为他人和社会构筑了安全，却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他们创造了财富，却无法公平公正分享财富；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光荣，但光荣却一直不属于他们。这一切应该得到改变，除了向老板讨要工钱，我们还应努力向这个社会讨要完整的工人身份和公民权利。

在这大工地的十年江湖里，我从青年步入中年，有了我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正如一位工地管理者对我所说，大工地，一经踏入就难以脱离。我想他说对了，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么长时间。如果说最初是因为同情而选择陪伴，那么到了后来，则是因为我已经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不应是等待救助的弱者，自然也就不需要“助人自助”这套理念加诸于他们身上，

他们是一股比任何群体都进步的力量。只不过，此前我习惯于从这种“金字塔”或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中去看待他们，不觉间我自己的眼睛被蒙蔽，觉得这是一股等待被救济的群体。

底层地位的改善以及“去弱者化”必须仰仗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为自己存在”的“我们”而非“为他人存在”的“他者”，对话与行动构成底层进行解放实践的核心理念。基于这种积极的理念，进步社会的实践应该指向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是开展对话性教育，教育底层民众了解自己在转型陷阱体制下的处境，实现自身的价值认同，发展一套底层的解放文化，通过对话性关系来开展教育，达到批判性反思的目的。

第二是建立人与系统的连接，帮助底层民众发展出和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系统的连接，建立自己的资源网络，弥合转型陷阱下断裂性的社会结构。

第三是建立支持系统，对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群体试图将改革中的过渡体制固化下来的保守力量进行反抗。通过历史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达成底层自决，集体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底层解放。

第四是个人与结构的反应，公益从业人员应该成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者，并与底层变革者一道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

在这四个维度上，我们就能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公益从业者所具备的品质——一个好的对话者和行动参与者。

具体来讲，我们应该集反思者、参与者、同行者、使能者和解放者五种角色为一身。我们首先应是一个反思者，通过与底层的对话和底层实践，能够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再者，我们应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期望参与底层行动过程中，能够增强自身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度和切身感知度，并形成理性的思考。第三，我们还是底层行动的同行者，在底层自觉自为的行动过程中，我们与底层不是有所割裂的，而是与他们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共同行动的。第四，我们还应是使能者，然而这种使能不是单向的，这是一个相互使能的过程，在这样生产关系再造与共造的过程中，我们是有着共同成长的团体动力的。最后，我们还应成为解放者，我们应该是社会解放实践的一员，我们不但把推动底层从转型陷阱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我们自身参与社会解放实践的空间。

**(如需索取《大工地诗歌集》纸质版，请发邮件至：[renjianhope@163.com](mailto:renjianhope@163.com)，列明您的姓名、收件地址、所在单位和电话号码，我们会安排给您邮寄。)**